

现代东亚经济论

[韩]安忠荣 著
田 景 等译
李相文 校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东亚经济论 / (韩)安忠荣著,田景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
ISBN 7-301-06835-2

I. 现... II. ①安... ②田...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东亚 IV. F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245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4-0556

GENDAI HIGASHI AJLA KEIZAI RON

by Ahn Choong Yong

©2000 by Ahn Choong Yon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2003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4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本书中文版专有使用权归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有

书 名:现代东亚经济论

著作责任者:[韩]安忠荣 著 田 景 等译 李相文 校译

责任编辑:梁鸿飞 刘云艳

标准书号:ISBN 7-301-06835-2/F·075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排 版 者: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7.5 印张 215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精装)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东亚经济 :从奇迹到沉没.....	(1)
第一节 东亚的多样性和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	(2)
第二节 Gerschenkron 的“后发优势”理论	(5)
第三节 世界银行的“奇迹论”	(10)
第四节 克鲁格曼的要素投入论	(11)
第五节 日本经济的高增长模式	(14)
第二章 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成果和局限性	(22)
第一节 亚洲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实用主义	(23)
第二节 东亚的雁行经济发展	(25)
第三节 出口主导型工业化	(29)
第四节 贸易、投资、金融的全球化	(34)
第五节 产业优先、金融从属型体制.....	(37)
第三章 韩国型压缩成长的功过 :政府和财阀主导模式.....	(42)
第一节 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机制的图式	(42)
第二节 出口鼓励体系	(44)
第三节 政府主导的工业化与财阀的登场	(49)
第四节 重化工业的不良化与贸易逆差的扩大	(56)
第五节 金融的落后与韩国型公司治理结构	(59)
第六节 压缩成长模式的局限性与 IMF 监管体制 的建立	(62)
1. 压缩成长模式的局限性	(63)

2. IMF 监管体制的建立	(65)
第四章 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主导模式	(68)
第一节 出口主导型工业化	(69)
第二节 中小企业主导型工业化	(72)
第三节 金融制度的效率	(77)
第四节 收益性和弹性为中心的经济	(80)
第五章 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主导模式	(84)
第一节 制造业主导的高速成长及结构转换	(85)
第二节 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结构转换	(90)
第三节 高速增长和经济的泡沫化	(95)
第四节 国际投机资本责任论	(98)
第六章 东亚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产业关联效应 的比较动态研究.....	(100)
第一节 产业关联效应与工业化.....	(100)
第二节 后向关联效应.....	(103)
第三节 发展战略的意义.....	(108)
第七章 东亚金融危机和结构改革.....	(110)
第一节 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和扩散.....	(110)
第二节 金融危机的波长和冲击.....	(115)
第三节 韩国四大部门的结构改革.....	(119)
1. 金融改革	(123)
2. 财阀、企业改革	(126)
3. 劳动市场改革	(128)
4. 公共部门改革	(129)

5. 压缩改革	(130)
第四节 马来西亚的结构调整.....	(131)
1. 外汇管制	(131)
2. 实质上的 IMF 改革	(134)
3. 经济回升政策	(136)
4. 展望 2020	(138)
第五节 台湾地区的结构调整和 21 世纪长期 发展战略.....	(139)
1. 21 世纪风险企业的培育.....	(139)
2. 金融部门的结构调整.....	(142)
3. 21 世纪发展计划	(144)
4. 人力资本的培育	(145)
第八章 东亚经济 :日本和中国	(147)
第一节 东亚的相互依存和超国家经济集团.....	(147)
第二节 日本的作用.....	(153)
1. 长期萧条与日本型体制	(153)
2. 金融改革与向内需主导型成长体系的转换	(157)
3. 从生产者主权时代向消费者主权时代转换	(159)
第三节 中国的作用.....	(160)
1. 体制转换的历史性实验	(160)
2. 金融改革与融入世界经济	(165)
第四节 加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体系.....	(166)
第五节 东亚的金融稳定与美国.....	(170)
第九章 东亚经济的未来.....	(172)
第一节 新增长范式的启示.....	(172)
第二节 学习发达国家的金融.....	(174)

第三节	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之间的相互学习.....	(177)
第四节	东亚的“善进化”.....	(183)
第五节	亚洲价值观的再思考.....	(185)
第六节	“东亚经济共同体”运动的开始.....	(189)
第七节	从沉没到再起.....	(195)
参考文献.....		(202)

第一章

东亚经济 :从奇迹到沉没

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东亚经济实现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持续超高速增长,曾被世界银行评价为“经济奇迹”(The World Bank, 1993)。所谓“东亚经济模式”还被许多尚在贫困中挣扎的低收入国家当作发展的福音。然而,1997 年 7 月,外汇危机在泰国发生后,迅速波及整个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东亚国家有的陷入了衰落的泥潭,有的被迫接受世界银行的姊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紧急金融救助,这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韩国作为第一代新兴工业国的一员,30 多年持续高速发展,从最贫穷的亚洲型农业国发展成一个准发达工业国(semi-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y),并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6 年 12 月 12 日);另一个同属第一代的台湾地区同时实现了增长和均衡,成为战后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典范;被称为第二代亚洲新兴工业国的马来西亚,工业化起步比第一代新兴工业国(地区)晚了 15 年,但在工业化的跃进(spurt)方面创造了新纪录。上述三个国家(地区)在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奇迹报告”(The World Bank, East Asian Miracle, 1993)中被誉为亚洲高速增长经济(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 : HAPes)的代表。本书将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定义为东亚具有代表性的“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①

以东亚外汇危机为契机,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接受IMF的紧急金融援助并开始了广泛的结构调整,台湾地区成功地躲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浪头,马来西亚则未接受IMF金融援助,谋求独立的经济复苏。在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加速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世界经济新潮流中,东亚经济是走出目前的危机东山再起,还是像20世纪80年代的中南美洲国家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那样,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模式呢?

本书的目的在于从东亚“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发展和挫折的历史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迄今为止,东亚国家一直不断学习西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知识。同样,为了今后经济持续发展,东亚各国还要继续学习金融部门和知识体系方面的先进制度,同时也应从东亚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不同的发展模式互相取长补短,并系统地加强区域合作,这是本书要着重强调的。

第一节 东亚的多样性和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

一般来说,东亚包括1993年世界银行东亚奇迹报告书(East Asian Miracle)中称为“高速增长经济”的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盟成员国以及在东亚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和1978年以来凭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上述东亚国家(地区)在国土、人口、产业

^① 本书同大部分经济发展比较文献一样,把亚洲第一代新兴工业国(地区)定为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第二代新兴工业国定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这些新兴工业国家(地区)中,韩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在外向型模式内分别通过独特的发展战略迅速实现了高速增长和结构转换,因此本书中把它们看做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归准发达国家(地区)范畴。

结构、人均收入、自然资源、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各具特色。

谈到东亚经济,当然包括日本和中国经济,但本书的研究重点是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实现了高速增长“新兴工业国(地区)”,区域内经济最发达的日本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中国只作为环绕“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外部条件来论述它们的作用。东亚的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还可以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但这些国家不仅在发展成果上落后,而且从发展模式的性质来看,也不能归入区域内优秀三国(地区)形态,所以没有进行详细分析。

在东亚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中,作为突出典范的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属于Chenery和Syrquin^①为进行国际比较而分类的人口大国的范畴,拥有一定规模的领土,因此,它们的发展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具有较为广泛的实践性意义。这三个国家(地区)具有东亚经济模式的共同特点,即在出口主导和资源配置方面通过强有力的政府介入实现了经济发展。

至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由于它们是城市国家(地区),又是国际物流及金融转口贸易港,没有资源开发和农业部门,因此,它们的发展战略是特殊的,难以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般模式采用。Papanek(1988)认为,在东亚第一代新兴工业国(地区)中,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具有城市国家(地区)的特点,台湾地区则与中国大陆有特殊的政治关系,因此,他把韩国模式定为东亚发展模式的代表,并据此

^① Chenery and Syrquin (1975)和Syrquin and Chenery (1989)在国际产业结构抽样分析中,把人均收入、国土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作为主要说明变量。这三个变量达到一定范畴时,把产业结构的变化诊断为按初期产业(early industry)、中期产业(middle industry)和后期产业(late industry)等一定顺序进行。按他们的分类标准,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属于中等收入国(地区)和人口大国(地区)的范畴。

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许多优势。^①但是,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在过去的20—30年间实行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实现高速增长并迅速转换了产业结构,因此,本书将它们称之为东亚“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把它们的发展模式作为东亚模式的典型。东亚这些“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在长期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榜样,然而在1997年7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它们却面临不同的经济状况:韩国直接接受了IMF的金融援助;马来西亚在邻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入IMF管制及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依然拒绝接受IMF的金融援助,通过外汇管制的特殊方法克服了经济危机;台湾地区则未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直接传染,除了因东亚区域内进口需求的骤减而发生的出口增势减弱以外,台湾地区基本维持了增长和稳定的局面。

表1 东亚主要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指标和IMF金融支援状况

国家 (地区)	1996年 人均GDP (\$)	GDP年平均 增长率 (1970—1996)	GDP 增长率 (1997)	GDP 增长率 (1998)	1996年末 上市股市 股总额 (10亿\$)	1996年末 外汇储备 (10亿\$)	接受 IMF金 融救济 与否
韩国	12410	8.4	5.6	-5.8	138.8	34.04	接受
台湾地区	17720	8.3	6.3	4.8	273.7	88.04	无关
马来西亚	9703	7.4	7.4	-6.3	307.2	27.00	无关
印度尼西亚	4280	6.8	5.4	-13.7	99.8	18.25	接受
泰国	8370	7.5	-0.7	-7.0	80.6	37.73	接受
菲律宾	3060	3.6	4.8	0.6	80.6	10.03	接受
新加坡	25650	8.2	7.6	1.5	150.2	76.85	无关
中国	3120	9.1	8.9	7.8	113.7	107.48	无关

注:菲律宾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2年开始得到IMF的金融救济。在1998年3月开始两年间得到追加特别提款权资金10.2亿美元。

资料来源:IBRD,IMF,EIU各年度报告。

^① Papanek (1988)在分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时,提出了印度模式、俄罗斯模式和中国模式的概念,并把东亚模式概括为政府主导和出口主导的高速增长模式,认为“韩国模式”是其代表。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1970—1996 年期间,东亚主要发展中国家(地区)在出口主导型成长这一共同的发展体系下实现了 GDP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7.4%—8.4% 的高速增长。但 1997 年中期以来,以东亚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东亚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显然受到了不同的冲击,采取了不同对策。为什么会这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比较一下东亚三个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在外汇金融危机之前实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体制,这是个有意义的课题,是对金融危机之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所必需的。

本书的分析顺序如下:首先,比较过去 30 多年间东亚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在外向型发展战略下走过的工业化跃进(industrialization spurt)道路;其次,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对发展体制的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进行重点评价;第三,探索金融危机后(post-financial crisis)的发展模式。分析框架除了包括 Gerschenkron 关于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制度的所谓“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之外,本书还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可以通过对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彼此的优缺点进行取长补短而产生“相互学习效果”(mutual leaning effect)。如果今后东亚能够积极发挥“后发优势”和“相互学习效果”,并以东亚经济大国日本和中国为中心建成共生型区域合作体系,那么东亚经济就能面向 21 世纪,走出低谷。

第二节 Gerschenkron 的“后发优势”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强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大,欠发达国家认识这一差距并谋求发展的自我意识和压力越大,就越能体现 Gerschenkron 的“后发优势”理论。该假设可以解释为:欠发达国家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和制度,可以实现工业化的跃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即“追赶式(catch up)模式”(参照 Box 1)。“后发

优势”学说基本上是一个单向移动理论体系,以技术和知识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为前提。Gerschenkron 认为,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并不是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过程的简单重复,而可能实行发达国家所没有的新组织和替代的发展手段,因此,从速度和内容来看,它们的工业化与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路程之间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① 罗斯托在他的成长阶段理论中提出定型化模型,认为不发达国家要具备某些先行条件后才能进入经济成长的飞跃阶段。Gerschenkron 批评罗斯托的先行条件论是对工业化过程的片面看法,他把“先行条件”解释为工业化的阻碍因素或工业化之前应具备的条件。罗斯托的先行条件理论可以解释为欠发达国家搞工业化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而不可能搞工业化,但 Gerschenkron 认为,工业化一旦启动,阻碍因素都可以转化为工业化的促进因素。Gerschenkron 认为,工业化不能简单地用“先行条件”来解释,由于相对落后程度或工业化起步时期不同,或者由于对工业化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间的矛盾和紧张等的反应(response)程度不同,工业化在后进国家有可能爆炸性地发生。

Box 1**Gerschenkron 的“后发优势”理论**

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 Gerschenkron 在他的名著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 1968) 中提出,欠发达国家可能发生突发性的工业化跃进(industrialization spurt)。由于相对落后程度或工业化起步时

^① “后发因素”及后发优势,参见 Gerschenkron (1996) 年第一章 pp. 1—30 和第二章 pp. 31—51。罗斯托认为经济发展有明确的阶段性,主张经济发展 5 阶段论,特别强调必须满足先行条件才能进入飞跃阶段。

期的不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不同模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越大、工业化起步越晚的国家，越容易发生工业化跃进。

罗斯托用传统社会(The Traditional Society)、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The Precondition for Take-off)、起飞(The Take-off)、成熟(The Drive to Maturity)、高额群众消费时代(The Age of High Mass-Consumption)的定型化框架来说明经济的成长阶段。罗斯托对18世纪和20世纪的欠发达国家一视同仁，试图用同样的分析方法来进行说明，而Gerschenkron则认为，如果工业化起步的年代不同，或尽管起步年代相同但落后程度(degree of backwardness)不同，工业化启动因素和形态就不同。

Gerschenkron认为，经济起飞前必须克服而且适用于所有欠发达国家的标准化的阻碍因素或典型的先行条件并不存在，即便不具备所谓的“先行条件”，也有许多可以替代它的代用手段。

英国在产业革命前经历了数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它通过剥削殖民地、海盗行为等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以此为基础，18世纪后半叶准备了产业革命所需要的投资资本。而后起的德国，未经过英国式的重商主义型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银行制度筹集了资本；19世纪的俄国，没有殖民地经营和银行制度，是通过政府强化税收的方式筹集资本的。如今，如果欠发达国家缺乏管理开发的国内专家，就可以通过引进国外专家来解决（参见Gerschenkron, 1962: 第二章）。在东亚无资源新兴工业国（地区），能够扩大出口的国际条件、国民的追赶意识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领导力等都起到了工业化替代手段的作用。

东亚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在进行工业化跃进期间，除了实行以新古典学派的竞争和市场原理为基础的外向型出口主导增长战略

以外,还具有在经济运行中为培育特定产业而实行政府主导和介入的特征。从 Gerschenkron 的理论来看,东亚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战略除了通过接近发达国家市场来扩大市场和实现规模经济的好处外,还通过学习先进制度和技术的直接机会取得了外部经济效果(externalty economies)。^①但是,Gerschenkron 指出的发展的替代手段并没有在所有的东亚国家出现,即使同属出口主导型模式,各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形态也是不同的。依靠外资的韩国的资本积累方式、依靠外国直接投资的马来西亚方式、重点动员内部资金和居民储蓄的台湾地区方式便是证明。与东亚国家不同,拉美国家谋求将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和资源配置的表决权内部化,追求自主发展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结果荒废了 20 世纪 70 年代。

东亚经济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进化过程和长期波动理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也可以反映出来。金泳镐教授把东亚的工业化与革命发生时期、工业化主体以及帝国主义相联系,阐述了四代工业化理论。第一代(英国)和第二代(法国、德国、美国)工业化是在彻底的民主革命之后进行的,民间企业和银行成为推进工业化的主体;而第三代(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工业化是由国家和民间大企业主导的,但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且是后来发生的;包括东亚先行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第四代工业化国家(地区)群,是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状态独立后,由国家、外资、民间大企业作为工业化的主体起了作用,其民主革命不仅不彻底,而且是在工业化以后发生的。^②

^① 面向出口的经济所享有的外部经济效应,除了可以直接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制度之外,还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知识来减少搜集信息和交易的成本。参见 Rhee, et al (1984)。

^② 参见金泳镐(1989) pp. 17—30。

Box 2

第四代工业化论

金泳镐教授(1989)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用四代工业化论来说明,他提出的工业化世代论有别于阶段论和类型论。通常把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产业革命称为 First Comers,把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美、法、德的工业化称为 Late Comers。金教授则分别称其为第一代、第二代,并把日本称为第三代,把二战后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视为第四代工业化模式。

这一世代论是把工业化、民主革命、帝国主义的相互关系与长期波动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联系起来考虑的。即,第一代工业化是先发生民主革命后在市民秩序的基础上以中小企业为中心实现的,工业化的结果是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是康德拉季耶夫第一个长周期形成的。

第二代则是民主社会正在形成而未成熟,依靠政府的制度性介入,以大企业为主的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几乎同时完成,而且随着工业化进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民主化社会。这是康德拉季耶夫第二个长周期形成的。

第三代工业化正如在日本看到的,没有经历民主革命,在市民社会尚未成熟之前形成了由国家和大企业主导的工业化。由于帝国主义在先,虽然通过高度工业化逐渐形成了民主社会,但尚未完全成熟。这是康德拉季耶夫第三个长周期形成的。

第四代工业化国家饱受帝国主义压迫,虽然政治上获得独立而经济上仍处于依附地位,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是由国家、外资以及大企业主导的。结果,虽然民主社会正在成熟,但因国家和外资的介入形成了非自由的工业化模式。第四代工业化是康德拉季耶夫第四个长周期发生的。

第三节 世界银行的“奇迹论”

1993年,世界银行在题为“东亚奇迹”(The East Asian Miracle)的报告中指出,东亚八个国家(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地区、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在1965—1990年的1/4世纪中,比世界其他地区分配得更加平均,而且创造了最高的经济增长奇迹。这些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与地区(HPAEs)在过去的1/4世纪里实现了相当于亚洲其他地区的2倍、中南美和南亚的3倍、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区非洲国家群的5倍的经济增长,其增长速度甚至高于中东产油国。^①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HPAEs实现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和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因此说创造了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世界银行认为,“东亚奇迹”的基本因素有:①高比率的储蓄和高比率的民间投资;②积极培育人力资源等政策引导了增长;③坚实地维护了经济基础变量(economic fundamentals);④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等政府的有效支援推行出口主导型战略;⑤开发基础设施;⑥积极引进国外技术;⑦培育引导发展的金融机构。^②

有关东亚经济奇迹的理论,根据对政府作用和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认识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新古典学派和修正主义两种立场。持新古典学派立场的人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是忠于市场经济原理和价格杠杆的结果,是上述诸因素中坚定维护基础变量、对外开放、培育人力资源等措施作用的结果;相反,持修正主义立场的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于政府介入,即通过有意识地改变鼓励制度培育特定产业的结果。^③

① 参见世界银行(1993), pp. 1—26。

② 同上书, pp. 27—32。

③ 参见 Amsden, Alice H. (1989), 第五章, pp. 115—137。

在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奇迹”经验范例的许多条目中,拥有一定人口和国土规模的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的发展成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是,被作为“经济奇迹”象征的东亚先行三国(地区)中,韩国和马来西亚却被世界银行的姐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诊断为债务偿还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韩国,是其中惟一一个直接接受了IMF紧急贷款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第四节 克鲁格曼的要素投入论

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报告书遭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根本性批判。1994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中,克鲁格曼教授利用总要素生产率指标(参见Box 3)评价说,东亚经济只不过是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和资本实现的要素主导型增长(input-driven growth)而已,并不是效率基础上的增长(efficiency-driven growth);在东亚,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已达到极限,而且正在耗尽,所以东亚的高速增长不可能持续。他的最终结论认为,所谓“东亚经济奇迹”只不过是所流汗水的回报(perspiration)而已,东亚模式缺乏促使效率增进的创造性和灵感(inspiration)。

克鲁格曼的解释基本上没有脱离新古典学派的增长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将庞大的劳动力和有限资本结合在一起,就显得资本的生产率很高。尤其是发达国家有充足的资本,发展中国家需要时可以轻易取得。但是,随着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资本生产率渐渐下降。例如,为扩大人力资本的数量而实施的教育投资,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获得高收益,但终究会减少。